

# 《草叶集》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传播

韩德星

**摘要:** 惠特曼是对中国新诗影响较大的诗人之一,其《草叶集》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已有9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学与历史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草叶集》的译介与传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五四时期,它是民主的象征与革命的艺术符码;在抗战时期它是救亡图存、鼓舞人心的战斗号角;在文革以后,它是张扬自我、独自喧哗的一棵大树。它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过程恰恰彰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自身的品格。

**关键词:** 草叶集;新诗;现代化;译介;传播

**作者简介:** 韩德星,男,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I71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3) 06-0089-07

《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是美国诗人华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倾尽一生心血的唯一一部诗集,并最终为其奠定了美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这部伟大诗集在美国本土经受了近一个世纪毁誉参半、备受争议的沉浮与挣扎,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百周年纪念以及美国诗坛摆脱学院派与新批评派的控制时才获得普遍认可。在中国大陆,惠特曼于五四时期被介绍过来,由于其诗作中易引起争议的诗篇未曾与中国读者谋面,因此批判与否定《草叶集》的声音并未出现,而到了1987年全译本首次出版时,对惠特曼的认知亦早已超越了早期的道德训诫阶段。尽管如此,由于时局的不断变化,在栉风沐雨的漫长世纪中,我们对《草叶集》的接受也经历了相应的起伏波折。本文将以时间为序,通过对该诗集在我国大陆译介与传播历程的简要回顾和整理,以图呈现它在中国大陆本土化亦即参与和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 一、五四时期《草叶集》的译介与传播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艰难起步时期,作为现代自由诗开创者的惠特曼的引入应是一种必然。1917年,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力主“八事”,陈独秀与之呼应,在《文学革命论》中倡导革新文学的“三大主义”,这些理论宣言无疑为新文学树立了一面旗帜,但如何打破传统诗学与美学的厚墙从而开辟一条新路来仍是一件难事,而翻译却为此提供了一件利器。卞之琳先生在1987年专门就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做过细致分析,他通过对胡适翻译实践的研究,鲜明地指出西方诗歌的翻译可谓促成了我国白话新诗的产生,且后来对新诗的发展过程及重大转折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①</sup>亦如有的学者所说,“没有译诗,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就会因为失去影响源而难以发生”。<sup>[1]</sup>可以说,五四时期积极参与到新文学运动中的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文学翻译,翻译工作已成为文学革命事业血肉一体的组成部分。而根据统计,在这一时期译介最多的三位诗人就是泰戈尔、歌德与惠特曼。<sup>②</sup>

大陆第一篇介绍惠特曼及其诗歌的是田汉发表于1919年7月15日《少年中国》创刊号上的文章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胡适曾用文言译过拜伦的诗,也创作了不少白话诗,但他自己亦认为偶尔用白话翻译的现代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抒情小诗《关不住了!》(发表于1919年3月15日的《新青年》)才是真正“开了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参见卞之琳《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参见王晓生《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67页。

《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共有八个部分组成：“美国精神与民主主义”，“惠特曼的略历”，“惠特曼的伟大”，“惠特曼与 Americanism”，“惠特曼与 Democracy”，“惠特曼的灵肉调和观”，“惠特曼的自由诗与中国的 Renaissance”，“纪念惠特曼的意义”。田汉写作此文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要把惠特曼高歌的平等、自由、博爱的美国精神“做我们的借镜”，指明只有“民主主义”能够救“少年中国”，<sup>[2]</sup>也可以说，他要阐明惠特曼的伟大之所在，为“少年之中国”寻找一个杰出的“人”的榜样以教给大家如何做真正的“人”，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了阐述惠特曼的思想上，而在论证这些思想时则频频引用《草叶集》中的诗歌，如《自己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母亲，你同你那一群平等的儿女》等诗的一些片段，以及《久，好久，亚美利加啊》的全篇，这也是惠特曼诗歌与国人的首次见面。此外，田汉也明确阐述了中国新诗运动与惠特曼诗歌的关系，“中国现今‘新生’时代的诗形，正是合于世界的潮流、文学进化的气运。……这种自由诗的新运动之源，就不能不归到惠特曼”。<sup>[2](310)</sup>

中国新诗的革新显然不只是一种形式的革命，也是思想和文化观念的革命，因此田汉对惠特曼及《草叶集》的介绍可谓是切中肯綮且意义深远，而接下来的郭沫若更是将对惠特曼诗歌的这种双重吸收与转化推至极致，从而创造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丰碑——诗集《女神》（1921）。反过来看，《女神》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惠特曼诗歌在中国大陆的可接受性，至少它极大推动了中国诗坛对惠特曼诗歌的进一步认知与传播。遗憾的是，尽管受惠特曼如此大的影响，并且作为一位大翻译家，郭沫若却并未怎么翻译这位先师的诗作，远不及对泰戈尔、雪莱、歌德等人诗作的译介。据其著译年谱查看，他仅完整翻译过惠特曼《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一诗，发表于1919年12月3日的《时事新报·学灯》。<sup>[3]</sup>另外，在1920年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他也曾引用《坦道行》（即 Song of the Open Road，今译《大路之歌》）第一节的前两小节原文，并将之译成白话，<sup>[4]</sup>但也就此打住，未再译完。

1921年5月20日的北京《晨报》第7版的副刊上刊登了笔名为“残红”的一位译者的《译惠特曼小诗五首》，即《美丽的女人》、《母亲和婴儿》、《告诉你》、《戴面具的》和《告外国》五首短诗，其中《告诉你》和《告外国》选自《铭文集》（即《草叶集》第一部分，以下各集的名字均采用楚图南、李野光合译《草叶集》中的译名），另外三首选自《路边之歌》。这些小诗显然不足以反映惠特曼的思想与风格，引起的关注并不大。此前，也就是同年3月，主持《小说月报》的沈雁冰在该刊第3期“海外文坛消息”栏目中专门发了一条“惠特曼在法国”的消息，极力强调“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著作近来在法国盛极一时”。<sup>[5]</sup>10月份，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谢六逸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两篇译作，即选自《桴鼓集》中的《挽二老卒》（今译《给两个老兵的挽歌》）和《弗吉尼亚森林中迷途》，11月上旬又在该刊连载了《平民诗人惠特曼》一文，也许因有田汉的文章在先，所以，他并未对惠特曼的民主思想展开评介，而是突出诗人的“普通人”的身份，评价其诗歌是“自然的复写”，是“个性的动作的呼声”。<sup>[6]</sup>1922年3月，译者东莱在《文学周报》旬刊第30期上发表了译诗《泪》。徐志摩翻译了《自己之歌》中第31节的第一小节和32节的前两小节，发表于1924年3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3期。崇尚格律与节制的徐志摩对惠特曼也许未必真心喜欢，因此浅尝辄止，他与“中国的惠特曼”——郭沫若的反目也与对自由奔放式诗歌的讥讽有关。此外，这时期一些对美国文学的介绍类文章中也多有谈及惠特曼的诗歌，如刘延陵发表在1922年2月15日《诗》月刊第1卷2号上的《美国的新诗运动》，郑振铎在《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12号上发表的长文《美国文学》。

20年代后期，鲁迅先生对《草叶集》的译介也作出了贡献。1927年6月，他主编的《莽原》杂志发表了韦丛芜翻译的《敲！敲！敲！》和《从田里来呀，父亲》（皆选自《桴鼓集》）。1928年10月，他主编的《奔流》杂志刊登了金溟若翻译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长文《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

文中还配有五张图片，分别是一帧惠特曼画像，《草叶集》初版时诗人照像，诗集插画一帧，诗人笔迹，及诗人晚年位于坎登的住所。有岛武郎以第一人称的创作形式来表述对惠特曼及其诗歌的理解，文章充满激情和力量，引用《草叶集》中诗歌或片段达23次之多，涉及诗人十余首代表性诗作。<sup>[7]</sup>如此完整地介绍《草叶集》，在大陆还是首次。在刊发之前，鲁迅先生曾多次与金溟若通信，为了更好地审阅译稿，还前往商务印书馆及内山书店分别购买了英文及日文版的《草叶集》。<sup>[8]</sup>

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大陆对《草叶集》的译介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和随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性。20年代是新文化运动扩张和扩大其作用范围的时代，也是白话诗学步行行走的时代，当时诗坛充满对《尝试集》、散文体诗、诗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在思想上偏于认为人类的整体性优于民族与国家本位，在文艺上认为西土强于本土，对惠特曼及《草叶集》的译介显然是借它山之石欲以攻玉。除了诗学与文化的建构需求以外，深层次的人格建构的需求作为一种动力也推动着文人学者们去扩大视野寻求认同，正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欧美各国的自我发见，是在十九世纪的初期，中国就因为受着传统的锁国主义之累，比他们推迟了七八十年。自我发见之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北欧的伊孛生，中欧的尼采，美国的霍脱曼（即惠特曼，笔者注），俄国的19世纪诸作家的作品，方在中国下了根，结了实”。<sup>[9]</sup>事实上，在世界诗歌领域，对“超验自我”的书写很难有超出惠特曼之右者。

## 二、三、四十年代《草叶集》的译介与传播

如果说20年代是《草叶集》播种扎根的时期，那么，30与40年代就是发芽成长并渐渐枝繁叶茂的时期。1930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发表了一篇长达29页的长文《现代美国诗概论》，文章共五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专论惠特曼，达三千多字。该文对惠特曼的评论较前人更趋完整，谈到了惠特曼在美国本土的不被理解，谈到他对平凡东西、普通题材的选择，谈到他的中心题旨“是普天的同情心，是爱情想象，这种爱情想象，能使伟大艺术家，与人类一切悲乐同体化”，“他相信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及民主主义”，“他的个人主义，常在普遍的友谊善意中表出”。<sup>[10]</sup>作者朱復还条分缕析专门探讨了惠特曼的诗艺特征，引用《斧头之歌》与《展览会之歌》中的许多诗句。诗人邵洵美在1934年10月《现代》杂志发文《现代美国诗坛概况》，对惠特曼及其《草叶集》与现代美国诗歌的关系做了清晰的阐述，扩大了人们的认知视野。<sup>[11]</sup>在翻译方面，译者素衷在1931年6月《创作》月刊发表译诗《跨过一切》，7月又在同一刊物发表《看到荣誉获得时》等五首译诗，伍实在1934年12月《文学》杂志发表了其摘译的《自己的歌》片段和《灵魂啊你现在敢吗》、《再会吧我的幻想》、《为了你啊德漠克拉西》、《先驱啊先驱》等另外四首译诗，同时也译有英国评论家爱德孟·威廉·戈斯的长文《窝脱·惠特曼》。周而复则在1936年10月1日《诗歌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两篇译诗：《夜晚独个在沙滩上》和《在海船后面》。高寒（楚图南笔名）在1937年1月《文学》杂志“诗歌专号”发表篇幅较长的《大路之歌》完整译文。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进入到自觉的多元状态，对于诗体、现代诗、中国古诗借鉴等问题的讨论颇为热闹，朱復与邵洵美的文章即出于这一大的语境，也是为了确认《草叶集》的现代性地位。另外，这一时期左翼大众诗学开始成长起来，《草叶集》亦成为其形态源。如主张诗歌大众化的蒲风曾在《诗歌大众化的再认识》一文中写道：“惠特曼的自由诗的新形式，在当初，美国老诗人们也曾憎恶过，甚至驱逐过。我们今日的处境正相同于惠特曼，因为我们的东西，比惠特曼的口语的自由诗来得一样惊人，通俗”。<sup>[12]</sup>日军侵华更加重了诗人的现实感和紧迫感，所以他呼唤中国的惠特曼，“如今的现实却的确要求我们产生一些惠特曼，或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新的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担不起现阶段诗人的伟大任务”。<sup>[13]</sup>此外，早期倾心于象征主义的穆木天也转向为诗歌大众化呐喊，他在1934年

6月《现代》杂志发文《诗歌与现实》，号召诗人从现实出发，反映代表时代的本质情绪，“伟大的诗人，如杜甫，如雨果，如歌德，如惠特曼，如密尔敦，如魏哈仑等，之所以成为了伟大，就是在于他们在他们的诗作中，反映出当代的社会现实”。<sup>[14]</sup>评论家李长之在谈到惠特曼时也突出其现实主义，“惠特曼却是美国浪漫主义最后一人，同时却也是到达新的开展的桥梁的一人”，“新的开展是写实主义”。<sup>[15]</sup>林焕平在《申报》上的文章《我们从惠特曼学取什么?》同样强调“他那种完全从现实主义出发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是我们应该学取的第一点”，惠特曼不但是生活的观察者，“不，不但是观察，他就是投身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sup>[16]</sup>

40年代的中国到处战火纷飞，战争的鼓点、苦痛的大地似乎与70多年前惠特曼所经历的风雨腥风遥相呼应，于是，深受惠特曼影响的艾青、田间、何其芳以及七月诗派的诗人们像惠特曼一样纷纷以笔为旗，谱写出“鼓舞调”的战斗的诗歌。据李野光先生考证，1941年萧三从莫斯科把苏联出版的《草叶集》带回了延安，“使惠特曼得以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相结合”，<sup>[17](337)</sup>而且同年，“草叶社”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成员就有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公木、陈荒煤等人，这些人对《草叶集》的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如周立波在鲁艺讲名著选读就讲到过惠特曼的诗，公木则翻译过《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大路之歌》、《啊，船长！我的船长！》和《我坐着来观望》等诗篇，其他在延安的诗人如吴伯箫、曹葆华、天蓝、朱子奇等都选译过《草叶集》，艾青主编的《诗刊》，以及《中国文艺》、《解放日报》成为发表这些译诗的园地，而田间等人的手抄本更是在人们手中辗转流传。<sup>[17]</sup>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文人云集，《草叶集》的翻译更是遍地开花。如思想转向后的徐迟1941年1月在迁至重庆的《文艺阵地》发表从《芦笛集》中选译的6首短诗，陈适怀同年11月在桂林《诗创作》发表《惠特曼诗三首》。次年3月，陈适怀又在桂林《文艺生活》发表译诗《你，政治民主哟！》。当年适逢惠特曼逝世50周年，《诗创作》开辟了“惠特曼五十年祭”专栏，刊登了一组诗文，其中包括日本学者高村光太郎和中野重治的两篇评论，陈适怀译《惠特曼诗四章》（包括《在梦中所见》、《没有不要劳力的机器》、《给某歌女》和《一致》四首诗），天蓝译《反叛之歌（二首）》（即《欧洲》与《给一个受了挫折的欧洲的革命家》），曹葆华译惠特曼晚年所写散文《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同年11月，桂林《文化杂志》发有邹绎译自《桴鼓集》的《海船的城市》等三首诗，成都《笔阵》发有姚奈译自《桴鼓集》的《我做过一次奇异的看守》。1943年5月，桂林《青年文艺》刊发了宗玮译的《草叶集选》，包括《为了你，啊，民主》、《在一个梦里我梦到》、《哦，船长，我底船长！》等13首诗，同年9月，桂林《文学译报》刊登了蒋堃译《给一个快要死去的人》等3首诗歌。1948年，上海《诗创造》第8期和第10期分别刊发了屠岸的译诗《更进一步》、《我们两个——我们被愚弄了多久》和费雷译自《桴鼓集》与《铭文集》共5首短诗的《惠特曼诗抄》。

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是惠特曼诗歌翻译与传播的一个高峰期，如此密集的翻译也催生了《草叶集》选本的出现。第一个是高寒（楚图南）编译的《大路之歌》，由重庆读书出版社1944年3月出版。该选本分两大部分，第1部分由14首诗组成，惠特曼一些重要诗篇如《从巴门诺克出发》、《大路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当庭院中的紫丁香在最近新开了的时候》、《从永久摇荡的摇篮里》等均收入其中，第二部分是《草叶集》中最核心也是篇幅最长的《自己之歌》完整译文。楚图南为自己的选本写有《惠特曼的诗歌——〈草叶集〉译序》，对惠特曼及其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自序后面，他还附有自己的美国学者L. 昂特梅尔《关于惠特曼的诗歌》一文。该选本后来又于1948年由上海读书出版社重印。第二个选本，据李野光先生所述，应该是陈适怀所译的《囚牢中的歌者》，收短诗31首，“但此书已残缺不全，出版时地都难以确定了”。<sup>[17](339-340)</sup>第三个译本是屠岸的《鼓声》（配有插图），1948年11月以“青铜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印行。该选本收有《我在梦里梦见》、《敲啊，敲啊，鞞鼓》《哦，船长，我底船长》等52首短诗，并附有《惠特曼小传》、卡尔·桑德堡写的《〈现代文库

>本<草叶集>序》以及屠岸自己写的《论介绍惠特曼》与“译后记”。1949年3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高寒译《草叶集》，该选本保留了1944年版的序言及昂特梅尔的文章，开头增添了惠特曼年谱简表，但在体例上与前者不同，它按照《草叶集》原版的顺序，标明了全部12个子集的名称，并分别从中选译了共55首诗歌，呈现出一个虽然稀疏但却大致完整的框架，为以后完整译本的推出奠定了基础。

### 三、建国以来《草叶集》的译介与传播

反观民国时期《草叶集》的译介与传播，可以看出一条从涓涓细流到汇成江河的过程，从接受的思想角度看，又是依时局变化从20、30年代强调其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到抗战时期彰显其人道主义再到内战时期回归其民主主义的过程，这正如王佐良在谈到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时所说，“郭沫若师法惠特曼，别的年轻中国诗人又效仿郭沫若。中国新诗里的豪放传统从此开始，而豪放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里很快就从诗人的个人咏叹发展为民主的、群众性的强大歌声”。<sup>[18]</sup>朱自清先生在1947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国文学时也说：“用欧化的语言表现个人主义，顺带着人道主义，是这时期知识阶级向着现代化的路。”<sup>[19]</sup>惠特曼诗歌的译介与这条路是合拍的，而且是其中一组最强音。当然，《草叶集》在民国时期传播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阶层和文学范畴，而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做出了独有的贡献。所以，当1955年《草叶集》百年诞辰之际，新中国的政府在10月的北京隆重举行了《草叶集》百周年纪念大会。同年12月，上海举行了“纪念《草叶集》出版百周年和《唐·吉珂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座谈会”，巴金发言称《草叶集》是永远属于人民的巨著，认为惠特曼是“在人民中间生长起来的诗人”，“并且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惠特曼的诗对于今天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中国人民仍然有极大的鼓舞力量”。<sup>[20]</sup>据李野光先生统计，当年全国许多报刊发表相关文章共计20多篇，作者有巴金、徐迟、蔡其矫、袁水拍、邹绛、杨宪益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和学者。<sup>[17](341)</sup>徐迟在《译文》和《人民文学》发表了19首译自《草叶集》的诗，在《光明日报》发表译作《法兰西——美国的第十八年》，并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作了《论<草叶集>》的演讲。同时，楚图南1949年的选译本经王岷源校订后以《草叶集选》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增添了3首诗）。虽然是同样的版本，但由于政治气候的改变，意识形态成为当时翻译出版的一个标杆，所以在“译者后记”中，楚图南有意突出惠特曼诗歌对资产阶级美国的虚假民主、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及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支持立场，认为其诗歌“对于当前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摧残人权、种族歧视和扩军备战政策以及美国腐朽的黄色倒退文化是一把熊熊的烈火”。<sup>[21]</sup>

热烈的纪念活动过后，《草叶集》的译介很快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干枯期。民族国家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完全左右了中国大陆的文艺活动，先是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对欧美文学由正面译介转为批判与排斥，1958年兴起了贬抑五四新诗传统的“新民歌运动”，后是十年文革，西方文学翻译完全被中断了。<sup>①</sup>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楚译《草叶集选》，该书在饥渴的读者群中迅速流传。1979年，荒芜翻译并发表了惠特曼近20首诗，<sup>②</sup>当年及以后两年里又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惠特曼的散论性文章，发表于《诗刊》、《读书》、《诗探索》、《外国文学研究》等杂志，影响面甚广。黄药眠和王佐良也写过《读<草叶集>》的同题文章发表于1981年《读书》和1982年《美国文学丛刊》上，周珏良则翻译了《1855年版的<草叶集>序言》发表于1983年的《美国文学丛刊》。另一位

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惠特曼的影响就中断了，如文革时期出版多部诗集的李瑛深受惠特曼影响，其诗歌也带有惠特曼遗风。参见史记：《惠特曼诗歌在中国的评介与接受研究》（Ph. d），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② 另据李野光先生考证，荒芜多年前曾编译过一本包括100多首长短诗的《草叶集选》，原计划1957年出版，但最后由于政治原因计划破灭。参见李野光：《惠特曼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重要译者赵萝蕤早在1962年就接到出版社交给她翻译《草叶集》的任务，但不久被迫停止，<sup>[22]</sup>文革后重新捡起翻译工作，并连续在1983年《美国文学丛刊》1、2、3期和次年第2期发表译作12首，包括短诗5首，选自《林肯总统纪念集》的4首以及《大路歌》、《阔斧歌》和《从鲍玛诺克开始》3首，并且在每期译文前均附有相关介绍文字；1985年，《外国文学》第7期刊登她的两首译诗：《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和《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四季常青的相熟在成长着》，亦附“译后记”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它们；同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刊发其文章《惠特曼“我自己的歌”译后记》，这意味着她已完成对长诗《我自己的歌》的翻译工作，两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该诗单独出版。就在1987年2月，李野光在楚译《草叶集选》基础上补译完成的《草叶集》（上下册）全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依照《草叶集》“临终版”增补了其余的334首诗，又增添了《老年的回声》的14首，以及“未收集和未选入的诗”32首，并附有惠特曼写的《〈草叶集〉初版序言》、《致爱默生》等6篇重要散文文献。该译本实现了大陆《草叶集》翻译的历史性飞跃，成为国内公认的权威译本，甚至如学者刘树森所说，“从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介绍惠特曼的历史情况来看，也是理想的版本之一”。<sup>[23]</sup>该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草叶集》节选本《我在梦里梦见》，可谓袖珍版《草叶集》，由屠岸所译《鼓声》中的52首诗与楚图南译的《大路之歌》、《欢乐之歌》、《斧头之歌》、《转动着的大地之歌》四首长诗汇编而成。1988年，李野光借着全译本的东风，分别出版了专著《惠特曼评传》和选编的《惠特曼研究》（包括国外关于惠特曼的各种评论、诗歌及编者自己的两篇论文），为人们更好地解读和诠释《草叶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年，李视岐译注《草叶集诗选》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选本根据《草叶集》的不同版次、创作的不同时间向后推衍，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79首诗篇，并挑选其中难以理解的34首加以注析。在每一章前面，译者还编写了“解说”，简要阐述这些诗歌的创作背景及诗人的情况，便于读者更完整地解读。但是，该译本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可，翻译质量不高，问题很多，“从译文到注释内容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不但降低了译本本身的价值，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读者如实地认识惠特曼及其诗歌”。<sup>[23]〔34〕</sup>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诗坛风云变幻的时代，老一代诗人在文革后复出，朦胧诗崛起，随后又在1985年前后被新生代超越，诗歌中的“大我”不断向“小我”回归，在这个骚动不安、多元并举的时代，《草叶集》的传播影响与抗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文化界的译介重点“特别转移到20世纪的西方理论和文学创作上面，西方现代文论和‘现代派文学’，成为关注的焦点”。<sup>[24]</sup>尽管如此，张扬自我与自由的《草叶集》依然渗透到中国当代诗学的建构中，除了继续影响复出的老、壮年诗人如公刘、蔡其矫、昌耀等以外，对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和西川、海子、骆一禾、于坚等第三代诗人也颇有影响。如顾城在其《诗话录》中所说，“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洛尔迦和惠特曼”，<sup>[25]</sup>顾城强调诗人“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sup>[25]〔170〕</sup>而惠特曼的诗在他看来就做到了“穿起物象达到本体”。<sup>[25]〔78〕</sup>对年轻的诗人们而言，惠特曼及其诗歌可以说是一种必备的学识背景，但已不可能完全被其所左右，他们会超越惠特曼的影响，站在各自的诗学立场来评判惠特曼的诗歌。如海子就认为惠特曼像普希金、雨果等人一样是优秀的民族诗人，但却不是伟大的诗歌创造者，这些人“都没能完成全人类的伟大诗篇”，因为“他们没有将自己和民族的材料和诗歌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形象”。<sup>[26]</sup>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边缘化加剧，同时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出版越来越被市场所操控，变成了盈利与消费的对象。1991年，赵萝蕤花费10余年心血翻译的《草叶集》全本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仅印刷了2200册。其实，早在1988年3月，译者已完成了全部翻译工作，不幸的是碰到了一个“出书难”的时代。<sup>[27]</sup>该译本与追求尽意与神似的楚、李合译本不同，“以直译见长，注重内容与其文字表现形式的有机联系，对诗句的结构与内在韵律悉心推

敲，力求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容与艺术特色”。<sup>[23][33]</sup>2008年，重庆出版社也出版了该译本。1994年，楚、李合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在1987年出版该合译本以后，李野光就开始着手翻译自己未译的部分，并修改已译的诗稿，计划出新译本，这一愿望在2003年实现，其独译本《草叶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且两年后再版。

在一个诗歌不景气的时代，《草叶集》在新世纪的译介竟然呈现出一种迅猛姿态，短短十二年间，大陆有近20家出版社出版其选本或英汉对照本，不知名的译者纷纷冒出，各种噱头如“世界禁书库”、“中小学必读丛书”“中学生必读诗歌经典”逼人耳目。如果说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洗礼《草叶集》终于从政治抒情诗的名义中挣脱出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如今悍然罗列进中小学生的书架是不是是一种历史的玩笑？大学生都不去读或读不懂的东西如何会进入小孩子的心灵？从大众化的诗歌到诗歌的大众化，中间该有怎样的转换？是教育的普及，还是无缝不钻的经营使然？前辈的译者经历了多年甚至半生的苦心研究和辛勤劳作才换来字字珠玑，如今的译者短短数月就赫然交稿。我们希望惠特曼的诗歌能走进千家万户，但那应该是一本更接近本真面貌的《草叶集》。这些新译本的优劣将有更专业的人士去评说，我们也并不想一棍子打死，亦不否认有些译者的认真和敬业，我们只是想张扬一种责任感，当这些译著在传播、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要对得起每一个读者，更要对得起经过时间浪涛无情淘洗依然巨石般岿然而立的经典本身。

#### 参考文献：

- [1] 蒙兴灿. 胡适诗歌翻译的现代性探源——以《关不住了》为例[J]. 外语学刊, 2011(3): 133.
- [2] 田汉. 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A]. 田汉全集(14卷)[C].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311.
- [3] 龚继民. 郭沫若年谱 1892-1978(上册)[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72.
- [4] 黄浩淳编. 郭沫若书信集(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119-120.
- [5] 沈雁冰. 惠特曼在法国[J]. 小说月报, 1921(3).
- [6] 谢六逸. 平民诗人惠特曼[A]. 孙俎工. 新文艺评论[C]. 上海: 民智书局, 1925: 370.
- [7] 有岛武郎. 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J]. 金溟若, 译. 奔流, 1928, 1(5).
- [8] 钦鸿. 鲁迅对惠特曼的介绍[J]. 鲁迅学刊, 1981(2): 102.
- [9] 郁达夫. 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A]. 郁达夫文集(第6卷)[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171.
- [10] 朱復. 现代美国诗概论[J]. 小说月报. 1930(5): 813-814.
- [11] 邵洵美. 现代美国诗坛概况[J]. 现代. 1934(6).
- [12] 蒲风. 诗歌大众化的再认识[A]. 蒲风选集[C].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950.
- [13] 蒲风. 关于前线上的诗歌写作[A]. 蒲风选集[C].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922.
- [14] 穆木天. 诗歌与现实[J]. 现代. 1934(2): 220.
- [15] 李长之. 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J]. 现代. 1934(6): 894.
- [16] 林焕平. 我们从惠特曼学取什么? [N]. 申报, 1935-04-25.
- [17] 李野光. 惠特曼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338.
- [18] 王佐良. 读《草叶集》[A]. 王佐良文集[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02.
- [19] 朱自清. 文学的标准与尺度[A]. 朱自清选集[C]. 上海: 开明书店, 1951: 171.
- [20] 巴金. 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在本市纪念《草叶集》出版百周年和《唐·吉珂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报告(摘要)[N]. 解放日报, 1955-12-04.
- [21] 楚图南. 译者后记. 草叶集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324.
- [22] 肯尼斯·M. 普莱斯. 赵萝蕤访谈录[J]. 刘树森, 译. 高校社科信息. 1997(3): 43.
- [23] 刘树森. 评《草叶集》的六个中译本(下)[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2(2): 30.
- [24]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29.
- [25] 顾城. 诗话录[A]. 顾城的诗[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55.
- [26] 海子. 诗学: 一份提纲[A]. 海子诗全编[C]. 西川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049.
- [27] 区銜. 赵萝蕤译惠特曼[J]. 外国文学评论. 1988(4): 141.